

学人关注

她们在传媒从业道路上的探索与奋进

——新中国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四个阶段

研究视窗



报道巴以冲突的中国战地女记者陈慧慧。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闻中心，女记者们的忙碌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人民网记者翁奇羽/摄

记者的姿态进入新闻传媒行业，其身份特征在男女都一样的话语中很少被提及。这一时期传媒研究领域开始复苏，旧刊复刊，新刊创立，为女性传媒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较宽广的发表空间，但文章大多由媒体工作者撰写，不属于严格的学术研究。

1995年至2004年——转型期。这一阶段，跨越了两个世纪，彼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改革开放取得深入发展。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将“妇女与媒体”列为12个重点关切领域之一，引起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关注。同年，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领域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课题——《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和发展研究》，这标志着女性传媒工作者的研究从感性转向理性，放弃口号式的呼喊，更加强调学术的角度和立场，诸多研究不再使用事实感受描述式的“方法”，而是采用社会性别的视角进行分析。

这一时期的研究关注女性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关注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但多数研究者认为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女性自身的努力，鼓励女性传媒工作者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提升自己。

2005年至2014年——反思期。2005年，放眼世界新闻业，女性从业者数量首次超过男性。2014年，《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4》的数据显示，网络新闻从业者的构成中女性过半。随着女性数量的快速增加，“崛起”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声音。女性传媒工作者的相关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研究内容也愈发具体和细腻。大量研究者认为在传媒行业中，女性具有独特的性别优势，然而他们也发现，单纯量的增加并未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数量增加的背后隐藏着不显而易见的问题。因此，不少研究开始关注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身心健康问题、职业发展障碍。该时期的研究，不再将女性传媒工作者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而更多关注不同个体层面的女性传媒工作者面临的具体情况。

2015年至今——包容期。这一时期，新媒体崛起，短视频兴起。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信息生产的模式，为媒体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参与和表达的新空间。同期，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践行“四力”、凝聚“巾帼力量”等重大时代话题和任务被不断提出。作为实践性较强的领域，传媒生态的变革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有关基层女性传媒工作者的研究首次出现，越来越多文章出现在非新闻传播类的期刊上，研究者在坚持还原女性生命体验的同时，强调两性的并置研究，考察女性的同时也关注男性。新技术带来传媒生态的复杂化，研究视角向两性并置转换，其他学科理论资源和范式被引入，在上述多重力量的作用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多元与跨界的包容特点。

女性传媒工作者的存在，带来了诸如女性利益保护、男女平等意识加强、多元文化展现等方面的新鲜视角，她们的种种经历和思想观念是当代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通过对女性传媒工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使得女性传媒工作者在从业道路上的探索与奋进历程得以明晰，在引导公众强化男女平等观念上的促进作用得以彰显。同时，也有助于启发传媒行业从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视角挖掘和拓展新闻媒体的价值，更好地发挥媒体作为信息传递者、公民开路者的作用。

(作者为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赋权视角下全职妈妈的新媒体实践与身份认同——以广州市为例的质化研究》

作者：唐嘉仪

借助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研究以广州市全职妈妈群体为研究对象，从赋权视角出发，探讨新媒体实践如何影响行为，如何影响全职妈妈的身份认同情况。总的来说，全职妈妈群体的新媒体实践行动可以被大致归纳为三种形态，分别是“个体叙事型”“社群互助型”和“价值建构型”。结合赋权的理论视角，新媒体实践影响全职妈妈的身份认同方式有三条路径：首先，新媒体为全职妈妈带来一种得以在互联网空间上“表演”母亲角色的空间，全职妈妈通过积极的身份话语建构，增强自身的角色认同；其次，新媒体为全职妈妈构建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关系赋权的层面上新媒体实践提升了她们对全职妈妈群体的认同感；最后，新媒体赋予了全职妈妈参与在线的、居家的社会生产并获得经济回报的方式，从劳动赋权的角度来看促进了她们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同感的提升。

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年第6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女性主义法学的反思与重构》

作者：李勇

1995年至今，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已实现从兴起到发展的迈进。然而，或出于引介带来的对比偏差，或基于法律万能论和立法中心主义造成的认知局限，其间亦有诸多不足。本文作者认为，为弥补之，一是要批判“法律的性别为男”的预设，跳出性别主义二元论框架，代之以性别平等视角下的女性法制处境考察及修补性身份重塑；二是打破法律万能论的基调，认识到法律局限的固有性，转而限定原有的目标设定，并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一道促进中国女性全面发展；三是超越立法中心主义的视域局限，通过侧重实施来彰显法律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的生命力和权威性。以反思和重构推动发展只是阶段性任务，从长远看，所期待的不是中国女性主义法学得到何等的发展，而是其伴随女性法治处境的极大改善逐步走向消亡。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妇女经济行为影响因素多维研究》

作者：张竟竟

在乡村振兴中巾帼行动的推动下，农村妇女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出于一定经济目的做出的经济行为既有助于实现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又将助力乡村振兴。本文作者以河南省周口市某县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农户行为理论，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多层次构建农村妇女经济行为研究模型，分析农村妇女经济行为影响因素，并进一步以家庭资源禀赋为中介变量分析中介效应，以期对农村女性赋能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经济活动、文化技术、家庭资源禀赋、乡村振兴认知和资金需求对生产与技术应用行为和消费与营销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活动和乡村振兴认知对其他经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资源禀赋在身体心理层面和文化技术层面的潜在变量对经济活动的路径存在中介效应。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家庭总动员：数字劳动的家庭化和劳动的家庭分工重构——基于抖音的数字民族志研究》

作者：温欣

在数字世界，家庭被重新动员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参与数字的社会劳动生产，在劳动分工、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中展现出家庭化特征。本文作者认为，家庭化的数字劳动是数字社会个体应对劳动异化、劳动不稳定性感和情感劳动下的劳动控制等劳动风险的积极策略。家庭化的数字劳动不仅重组了劳动的家庭分工，还依托家庭性别与代际的重新分工，重塑了家庭集体生活和家庭伦理道德。数字劳动的家庭分工为全面理解数字社会劳动的多样化及劳动的主体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重构数字劳动尊严与团结提供了新的机会。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白晨 整理)

编者按

董小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这一群体进行学术研究，不仅可以弘扬她们的精神，更能为今后传媒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第24个中国记者节前夕，本文作者对女性传媒工作者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这些研究从横向来看，主要涉及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职业形象、生存现状、作品分析三大领域；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大致可分为介绍、转型、反思和包容四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这一群体进行学术研究，不仅可以弘扬她们的精神，更能为今后传媒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第24个中国记者节前夕，本文作者对女性传媒工作者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这些研究从横向来看，主要涉及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职业形象、生存现状、作品分析三大领域；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大致可分为介绍、转型、反思和包容四个阶段。

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的三个重点领域及变迁

从同质走向多样的职业形象。职业形象的内涵很广，包括专业能力、外在形象、内在形象等。20世纪90年代及以前，有关女性传媒工作者职业形象的研究数量不多且以女记者为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女记者们带着崇高的新闻理想，将自身的发展自觉融入国家民族的事业，带着参与社会变革的属性，这一时期女性传媒工作者的形象是积极的，也是同质的。21世纪以来，女性传媒工作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被逐渐发现。

首先，研究者们关注的媒体，从现实空间的报纸拓展到电视、网络以及虚构空间的小说、电视剧、电影；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新闻领域，拓展到时尚、娱乐、体育、军事等。研究者们也更加注重对媒体类型或内容的细分，其中对电视行业女性传媒工作者形象的研究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主要涉及谈话节目、新闻采访、帮忙类节目、人物专访节目等。其次，在诸多的形象要素中，女性传媒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最受重视，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又占据多数。此外，研究者们还向历史溯源，考察了近现代不同时期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职业形象。这些研究多从家庭和职业的双重视角切入，将近现代女性传媒工作者职业形象提炼为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事业为主兼顾家庭的职业精神。

从群体画像到深入个体的生存考量。职业生存状况的研究涉及职业基本情况、工作情况。此领域的研究始于1995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女性传媒工作者问卷调查，后续研究也多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涉及的行业领域不断增加，内容日益涵盖女性传媒工作者职业和家庭等多方面，考察的维度和指标趋于丰富。这些调查性的研究发现，女性从业人员的数量以及女性的自我意识、职场素养等个

体层面的“内部因素”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其他属于“外部因素”的生存状况并未获得明显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变革，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职业地位整体不高。

除了在群体层面的宏观考察外，研究者的视角也逐渐转向对个体微观层面的关注。学者们总结了女性传媒工作者的作品形式逐渐丰富，尤其是短视频思维等。2010年左右，出现了关于身心健康和自我认知的专门研究，其中职业压力、职业倦怠、成就感下降等有关职业枯竭方面的研究又占多数。这些研究发现，女性传媒工作者存在比男性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感，从而出现了比男性更加严重的职业枯竭现象。在应对策略方面，多数学者呼吁女性传媒工作者要加强自身的健康建设，并强调社会各界要建立和维护女性的社会支持系统。

从剖析作品到关注作品与人。研究者们关注的作品，从类型来看，早期以文字作品为主，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女性传媒工作者的作品形式逐渐丰富，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使得一大批以女记者为焦点的创作取得了较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创作者来看，研究者们考察的作品多出自新中国成立后的传媒工作者，但也指出老一代工作者的作品对历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重大意义；他们带着文字救国的理想，将本身的女性特质融入作品中，获得了女性对时代的主体性表达。

整体来看，多数研究只偏向于对作品本身的分析，包括作品的题材、采写特点、表达方式等。部分学者将创作者本人的经历和作品分析进行结合，不仅说明了作品如何，还在一定程度上交代了产生此类作品的原因。少数学者试图从社会性别理论切入分析，女性传媒工作者的作品中充满了女性视角，体现为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通过如实反映妇女的生活，将其作为一种积极的发展力量来呈现。对女性传媒工作者作品的研究从着重分析作品本身，转向更加注重作品与创作者、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

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的四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介绍期。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1985年，中国签署了《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进一步展示了推行男女平等政策的决心。这一时期女性的发展更多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共同因素下推动的，其中政治因素是主导。女性传媒工作者以被解放者或者社会建

一线调研

重视基层女性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彭杨扬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人才振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重视基层女性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她力量”，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丽乡村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对推动党的基层治理的发展和进步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村振兴是推进基层女性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条件

生态：乡村振兴改善人居环境。随着全面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发展的成果转换，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成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农村公共服务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整治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命题。比如，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笔者所在的贵州纵深推进农村“五治”这项基层治理重点工作，通过“治房”“治水”“治厕”“治垃圾”“治风”专项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普遍得以改善，村民宜居宜业的新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效果显著。

文化：乡村振兴推进性别平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三次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与妇女的基本权益，结合“治风”工作的纵深推进，不合理的婚嫁嫁娶习俗、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得到极大改善，基层女性不仅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理性选择“男耕女织”的性别限制，而且拥有了更多人生选择和发展的可能性。

产业：乡村振兴带动产业多元。在社会变革中，全国各地政府抢抓时代发展机遇，因地制宜为发展提供现实支撑，将地方差别优势作为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不断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随着数字经济的蓬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人才振兴。重视基层女性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她力量”，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丽乡村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对推动党的基层治理的发展和进步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发展干预，其政策和实践需要置于性别范式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村妇女从一般发展实践中不可见的“她者”，更好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能动主体。

勃发展和全面普及，大量创业者投入“电商+”的乡村创业新风口，促成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此外，服务业、手工业、新农业等产业的进步迭代，给广大基层女性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乡村振兴下的产业多元，打造了实现创业梦想的新舞台。

基层女性人才队伍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

基层女性人才的重要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基层女性已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不可或缺“她力量”。基层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贡献率明显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在利好的惠民政策和科学的管理机制双重保障下，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基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提高和改善。今年，全国妇联还出台了《全国妇联关于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实施“破难行动”的意见》，切实将妇联改革“破难”落地在基层、见效在基层，建强基层妇联组织，让妇联组织保障基层女性在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作用。

基层女性人才的时代机遇。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断创新举措，推出有利于女性人才到基层工作的利好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竞争。”面对人才强国战略带来的大好形势，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面做好乡村振兴的重要时刻，我国广大女性人才队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发展机遇。我国广大女性人才要把自身的奋斗追求融

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乘风破浪、拼搏奋斗。

基层女性人才的现实困难。我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推动女性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基层女性人才仍然面临着成长空间有限、社会角色负担重的现实困难。虽然基层党委政府普遍重视妇女权益，但我国仍处在体制转型期，现有体制机制无法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执行中“最后一公里”的堵点尚未畅通。在更多的妇女希望走出家门、渴望劳动致富的同时，基层女性还是不免因社会生产、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婚姻因素承载个人负担。

推动基层女性人才发展的对策

目前，基层女性人才发展仍然面临权益保障不够充足、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不够健全、产业发展形式单一、人才发展渠道不广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基层女性人才发展。

制度先行，建立健全支持基层女性人才干事创业的政策体系。一是建立基层女性人才的培养机制。加强基层女性人才队伍能力建设，要有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对基层女性人才的教育培训，依靠科学的体制机制推动队伍建设。二是加强基层妇女联合会队伍建设。吸纳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女性到妇联队伍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将基层女性人才团结起来。三是提升基层女性人才的生活保障。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加强对基层女性人才权益的保障和